

Stat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Linda Weiss

John M. Hobson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与经济发展

——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

[澳大利亚] 琳达·维斯 约翰·M.霍布森 著/黄兆辉 廖志强 译/黄玲 校

F112/33

2009

国家与经济发展

——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

〔澳大利亚〕琳达·维斯 约翰·M.霍布森 著
黄兆辉 廖志强 译 / 黄玲 校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C00160378

ates
conomic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Linda Weiss
John M. Hobson

当代西方学术文库·比较政治经济学系列 主编/朱天飏 执行主编/曹海军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Polity Press 授权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中文版。

国家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7-62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 / (澳) 维斯, (澳) 霍布森著; 黄兆辉, 廖志强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3

(比较政治经济学书系)

书名原文: Stat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SBN 978-7-80762-453-0

I. 国… II. ①维…②霍…③黄…④廖… III. 国家-关系-经济发展-研究-世界 IV. F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02906号

书 名：国家与经济发展
作 者：[澳]琳达·维斯 约翰·M. 霍布森
译 者：黄兆辉 廖志强
总 策 划：崔文辉
策划编辑：曹海军
责任编辑：顾学云
装帧设计：SDDoffice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650mm×960mm 1/16
印 张：21.875
版 次：2009年5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发 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80762-453-0
定 价：38.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序 言

这本书的写作筹备了四年。写这本书最初的想法始于1989年,当时琳达·维斯(Linda Weiss)正执教《现代国家的崛起》这门高级本科课程,同时也尝试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及机构的影响力做评估。而促使本书成形的是往后的一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研究假期期间,麦可·曼(Michael Mann)、尼克·哈特(Nicky Hart)、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鲍勃·布伦纳(Bob Brenner)和大卫·赫特(David Held)一起为本书加入了新的想法。后来大卫·赫特还当起了编辑,给予本研究热烈的支持。不过,当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于1990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加入研究才是真正的突破。两位作者来自不同的背景,一位来自资源丰富的国家,现正于制造业增值中寻找新的国家身份;另一位则来自一个曾是工业的始祖,现正努力收复其失地的国家。如此背景,一个澳洲人跟一个英国人的组合,似乎颇合适于探查国家的竞争力与工业的生命力。

后来,约翰·霍布森到了墨尔本,令我们更容易进行定期讨论。出版前一年我们的讨论更为热烈,我们互相检查对方的章节,亦多次重新改写每个章节。尽管最终版本是合著,每个章节基本是由一个人负责,霍布森是第2、3、4章的基本作者,而维斯则负责第1、5、6、7、8章。

我们在此想向同僚致谢,包括悉尼大学政府系、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政治学院,感谢他们的支持和向我们提供一个知识

之“家”。琳达·维斯特别感激悉尼大学政府系把“国家与经济发展”加入新的课程纲目。感谢葛兰恩·吉尔(Graeme Gill)、罗勃·蒂芬(Rob Tiffin)、戴缪德·马奎尔(Diarmuid Maguire)、伊恩·马什(Ian Marsh)对不同章节的早期草稿提供了宝贵意见。感谢约翰·菲茨杰拉德(John Fitzgerald)和朱天飏帮助弄清某些中国历史。不过,我们欠下的最重要的知识债,是麦可·曼,他的付出令很多不同想法结集成形。我们特别鸣谢这几年来他对我们工作的个人支持。但我们仍然会为本书的论据负全部责任。

我们的另一半,苏斯拉·达斯(Sushila Das)和约翰·马休斯(John Mathews),令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她/他们为本书的写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琳达·维斯	约翰·霍布森
悉尼	墨尔本

前 言

——什么是比较政治经济学？

朱天飏

2001 年末我参加清华大学组织的试讲时，题目就是“什么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看到听讲教师们一脸茫然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无论是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还是后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第一次开设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生课程时，都用“政府与市场”作为课名。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开课时也是要把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融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课里讲。但几年过去，形势已有所不同，我于 2006 年初出版了《比较政治经济学》一书，而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开设以“比较政治经济学”为课名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已经成为常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清华大学的曹海军老师建议和推动，吉林出版集团决定出版这套经典译丛。

比较政治经济学不为人所知完全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崭新的领域或边缘领域。比较政治经济学通过比较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政府、利益集团和市场的关系来探讨国家怎样管理经济事务。其实这个领域所研究的问题关系到我们每人每天的生活，也几乎是大众话题。跨时空比较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关系应该说早就有了，但真正成为系统的研究领域还是 20 世纪后半期的事。肖恩菲尔德(Shonfield)于 1965 年出版《现代资本主义(Modern Capitalism)》一书，将发达国家不同的经济政策与它们各自的历史和文化相连接，开创了当代比较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先河。后来学者们对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的应对政策的

研究更系统地比较了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更深入地分析了经济调整背后的政经互动及其模式,于是开创了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现在,比较政治经济学已发展成多方法(如比较历史分析和理性选择分析)、跨地区(不仅是发达地区还有后开发地区和转型地区)和跨时间(如早期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当代全球化的政经影响等问题)的研究领域。

当然,正是因为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铺开面很广,反而难以成形。这点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相比最能说明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领域都开创于20世纪70年代对石油危机之影响的研究。前者思考石油危机与美国的衰落对国际经济合作的影响,后者分析不同国家对石油危机的应对之策及其背后的政经互动。概括地说,前者探讨国际政治体系怎样影响国际经济事务,后者则比较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的政府、利益集团、市场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研究的是国家间的关系,另一个则是国家间的比较。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政治学的一部分,理论层次的争论虽然激烈,但都被整个领域所接受;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则经常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研究一个地区或主题的学者很少与研究其他地区或主题的学者对话,因此缺少几个能够为整个领域所接受的理论范式。我想我开设比较政治经济学课程、编写教材和主编经典译丛的根本目的就是希望将这个领域整个展示给大家。

如上所述,比较政治经济学是对政府、利益集团与市场关系的跨时空比较。政府、利益集团与市场也可以放大成为宏观的国家、社会与经济,而国家既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常用的概念,又是一个最容易被混淆的概念。国家至少有国际、国内和个人三个层次的含义。在国际层次,国家指的是“主权国家”,代表领土内人与物的总体,与其相对的是其他国家;在国内层次,国家是指由全职的官员组成和管理的一系列机构,对一定固定领土上的民众行使统治并垄断这个领土范围内的暴力工具,与其相对的是其统治的民众所在的社会;在个人层次,国家是政治家和官僚等个体组成的政府统治集团,与其相对的是其他个体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应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所讨论的国家主要是指国际层次的国家,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国家则主要在国内和个人层次上,特别是国内层次。

对国家概念清楚的理解不仅有利于我们读好比较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也有利于我们理解中国在不同层次上所面对的不同问题。比较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主题——国家、社会与经济的关系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题。如何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是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的关键。希望这套经典译丛的出版不仅能够促进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在中国的成形和发展,同时也能够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伟大事业贡献一点微薄之力。

这套丛书开始的选题计划和最后的审校都由我承担(个别非我学校的译著会明确标出审校者姓名)。我希望在此感谢曹海军老师。没有他的倡议和推动,这套丛书是不可能有的。曹老师作为执行主编还承担着很多具体事务性的工作。他耐心细致、温文尔雅,从容解决了各种问题,使我能够专注于丛书的审校。也要感谢吉林出版集团积极推动和支持这套丛书的出版,特别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崔文辉先生的大力支持以及王莹女士的具体联系工作。最后,我要感谢在我比较政治经济学课上学习的所有“孩子”,他们是我在中国推广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永久动力。

2007 年末

于北京大学廖凯原楼

前言

——变化世界中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彼得·J. 卡岑斯坦

国家与资本主义是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基本建构材料。这里有两种思考问题的线索。一些学者倾向于对政治结果的经济解释,运用供给或者需求等经济变量来解释选举或者对外贸易等与政治相关的结果;另一些学者则倾向于发展对经济结果的政治解释,例如,商业集团、劳工集团和国家这三者的力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导致非常不同的经济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

这两种视角可以用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概念来说明。基于国家固定的资源禀赋的假设,比较优势概念是新古典经济学贸易理论的基石。根据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观点,如果国家能够利用自己的相对优势而不只是绝对优势,国际劳动分工就可以给所有人带来最大的收益。但是,就像弗雷德里克·李斯特(Friedrich List)和其他批评者指出的那样,比较优势概念存在着重要缺陷。这个理论只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静态分析。按照它的逻辑,葡萄牙无论在1780年、1880年,还是在1980年就只能生产酒,而英格兰则可以根据比较优势学说从1780年生产服装提升到1880年生产重型机械,并再提升到1980年生产计算机芯片,从而因生产类型的提高在生产效率和经济福利上收获巨大。比较优势学说因此固化了一系列用市场语言来表达的政治关系,并且支持了那些导致各国经济不断趋异的政策。

对这个传统经济学概念的挑战来源于对竞争优势的一种明确的政治解释。根据这个观点,无论是葡萄牙的太阳还是英国的资本,每个国

家并不持有固定的资源禀赋。相反,竞争优势学说假设,每个国家经济都在努力增加它们的资本存量、加强它们劳工的技术基础以及促进科技知识在创造新产品和新生产程序过程中的应用。在过去两代人的努力下,亚洲的发展型资本主义成为竞争优势的大展示。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探讨国家兴衰、寻求解读动荡变迁的领域。

上述两种视点面临着同一个学术挑战:如何将观察到的政治或经济结果和政治或经济解释因素联系起来?特别是在两者相距甚远的时候。在他们各自的学科内,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曾发掘出对经济和政治结果令人注目的解释。但是,在现实世界里,经济市场和政治制度经常紧密相连。这两个学科因此都经历着扩展自己研究范围的冲动,建立在这个冲动上的进一步探索也是人性以及好的学术实践的自然发展。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的认知如何进步呢?因此,学者们不断努力将经济与政治变量融合以获得更强的解释力。

紧随上述学科的融合是有关研究方法的思考。与学科的内涵问题相比,方法问题是次一级的问题。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统计学与案例叙述并不是天生的优劣易辨。现实通过解释被分类并数字化,定量分析方法已经足够先进,能够将定类数据或定序数据转化成定据数据,并运用高级统计技术进行处理。哪一种方法论策略更合适,应该根据面对的问题而定,而不取决于不变的方法论偏好。有些学者认为,研究的科学性只能来源于对国家和大型国际组织提供的数据所做的统计分析,从而得出解释多种现象的规律。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准确和深入的理解需要获得原始数据以及对当事人生活经历的细微理解。这两种观点都有自己的学术局限与限制。自然科学与人文学在现实的时间——不可逆特性、推测性、非线性和非平衡性等特点上是有基本共识的。比较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大部分定量分析都普遍依赖一般线性模型,其实并不适合用来解释现实的许多重要部分。而另一方面,以案例为中心的定性分析往往忽视对非现实世界的系统质询,无论是通过反事实推理还是通过复杂性理论所提供的模拟方法。因为当代社会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比用于比较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多得多的分析方法,那些存在于定量与定性分析支持者之间的方法论争论,特别是孰优孰劣的争论,好像变得无地自容了。

现代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崛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最早的一批学者集中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如何通过各种途径适应混合经济与社会福利国家所达成的政治妥协,而这种政治妥协则将西方左、右两派的政治极端势力推向资本主义政治的中心地带。20 世纪 40 和 50 年代的国家化政治、60 和 70 年代的统合主义政治、80 和 9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治都游弋于这个中心的左右。上述每个时期都是重大变迁,每个时期都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演变增加了一个特殊的制度线索。

同样重要的是,半个世纪以来的国际化趋势增加了横跨国界的各种经济和社会交流的密度。其实,在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部分,国际世界已变成了全球的概念,对各种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都具有重要影响。在这个新的国际和全球背景里,崭新的资本主义与国家模式开始演化,特别在拉丁美洲、东亚、东南亚以及东欧地区,就连中东和非洲也出现了新模式的萌芽。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在比较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术发展中,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类型在现实中的增加,其分析类型反而变少了。对于研究中国高速发展和新型市场经济的学者来讲,为什么当代学术定式很难在新世纪成功解读中国市场经济的崭新特性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希望新一代的中国学者将这个问题当做一种挑战,努力解释这个市场经济史上的伟大试验。

2007 年末
于康乃尔大学

目 录

序 言	1
第 1 章 简 介	1
议题与研究领域	1
诸论点	2
国家力量的多种维度	8
从国家主义到新国家主义	9
每章概要	13

第一部分 欧洲崛起中的国家力量

第 2 章 欧洲崛起(一):国家的形成及其遗产	19
简 介	19
封建矩阵的定义	23
封建政治体制内的矛盾	26
封建政体的军事衰落	30
国家建设战略:剥夺地方贵族的政治权力	33
强国家的出现:英国	48
结论:中国镜子中的欧洲	55
第 3 章 欧洲崛起(二):17 世纪至 20 世纪	
早期的国家建设与经济形成	63
简 介	63

欧洲与中国的对比分析	67
国家、军事革命与欧洲经济的蜕变	73
国家的形成、战争与资本主义	80
战争、国家力量与工业化	91
结论:中国镜子中的欧洲	100
第4章 欧洲工业化下的强国家与弱国家	107
简介	107
格申克龙眼中的俄国工业化	113
专制统治与局部工业化	124
俄罗斯镜子中的英国工业化	128
1700—1850年英国备战的强烈程度	129
战争、国家与工业化	134
国家对工业部门的影响	139
结论:强国家与弱国家的重新定义	145

第二部分 东亚崛起与英美衰落中的国家力量

第5章 东亚崛起(一):国家与市场	151
简介	151
东亚成功的挑战	152
国家与市场结合:超越国家主义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	154
自由市场与有限政府:新古典的故事	156
结构化贸易制度:重估东亚的经验	158
治理市场:说明新国家主义的要素	166
差异形成:战略性产业政策	168
战略性资本主义与国家自主性	175
相反的论点	176
结 论	179
第6章 东亚崛起(二):治理式互赖	181

简介	181
有效干预的制度基础	183
治理式互赖	189
地缘政治:国家能力的动员	205
民主与工业的成熟:发展型国家的终结?	213
结论:动态政治经济中的国家力量	219
第7章 英美资本主义的衰落	221
简介	221
衰落的现实	226
寻找解释	231
制度束缚与国家:英国	236
英国:力量的弱点	243
制度束缚与国家:美国	246
美国的国家能力:由对外力量转为对内力量?	250
分析之后的启示(一):先发展国家与强国家	258
分析之后的启示(二):改变的前景	261
分析之后的启示(三):政治机构的角色——解释与对策	262
结 论	265
第8章 结 论	267
研究启示	267
未来研究的问题	280
对“西方”的教训?	283
附录一 国家收入	285
附录二 政府开支	287
附录三 间接税	288
参考书目	289
译者后记	329

第1章 简介

议题与研究领域

本书探讨一个有关比较政治经济的核心议题：政治机构在经济表现上的角色。现代国家令市场经济的发展起了什么变化？到底国家在什么情况下和为什么要帮助工业发展？为什么每个现代国家驾驭市场的能力都非常不同？以及，国家本身的力量及其对促进经济繁荣的重要性，在不同时代有什么变化？

本书的章节希望解释经济变化的模式，以及阐明在什么条件下，国家能够对经济结果做出和继续进行大幅调整。有些经济成果，如本书所述，其性质是世界历史的大事，或是划时代的，例如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工业化所带来的成果。其他的经济成果，在形态上则更为重要，如东亚的崛起，以及英美的相对下滑。因此，我们以新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方式研究国家发展，以古典经济学出发，即不单是研究贫穷国家，“而且是对一个长期、大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化进行研究，不管其是否发生在某时代或某区域内。”(Evan and Stephens 1988: 761)

本书的中心论点是，“强”国家——历史角度上，“强”的本质不断变化——是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改革的关键，这个中心论点同样能套用在发达国家，以及新的发展中国家。在国家发展的成功或失败这个问题上，新自由主义和其他一些理论观点夸大了世界经济和市场机制的重要性，亦因此低估了主权国家能否调动国内资源的不同自主性与

能力。我们认为,一个比较合适的观点是,要强调国家结构的分别、国家与经济的连接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些元素能告诉我们现代国家促进工业变革的自主性、战略和能力。因此,本书将说明国家力量有何不同以及从何处获得国家能力,让我们能够明白,无论对于过去或现在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它们工业发展的差异究竟是什么原因。

诸论点

本书的书名已说明了其中心论点。它强调一点,非经济机构——特别是政治机构——对现代市场经济的构造、维护和转变非常重要。^① 研究后工业化和第三世界发展的学者皆广泛认同,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在早期欧洲发展的年代,这种论调大多只是暂时性的,特别是在强调国家竞争力的现代工业化世界,尽管有个别不一样的例子。^②

不过,关注政治机构在经济发展成败中的角色是一回事,如很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发表了大量有关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有启发性的文献,而对政治机构角色的解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对国家活动的不同解释——无论是着重于核心或周边的活动——大多不能摆脱“经济主义”的逻辑(“economistic”-logic)。“政治的自主性”(autonomy of the political)仍然是令很多当代学者感到非常不安的想法。^③ 事实上,

① Karl Polanyi(1944/1975)的著作是重要的文献,它以政治制度观点来研究19世纪英国工业化的发展。Polanyi认为国家市场的出现并非自然地透过交易发生,而是透过国家促使的法例、机构和政策,因而产生国家与地缘政治的利益。

② Senghaas(1985)和 Gerschenkron(1982)指出了两项重要的例外,他们分析了19世纪欧洲于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化期间国家的角色。Peter Katzenstein(1985)的著作关于欧洲小国的工业调整,为较近期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③ 其中在马克思主义流派里的重大学术研究来自 Hobsbawm(1986)和 Wallerstein(1974)。例如,Hobsbawm认为,国家的贸易和商业政策——不论政策目的是为了保护当地市场或维护外国市场——都不过是当权者对生产商压力的反应,并不由军事或财政战略主导。有关政治概念化的简化主义和经济主义模式在19世纪的根源问题,可见 Atul Kohli 的简介(1986)。

考虑到国家因素的话,国家的自主性和能力,对受自由主义和其他理论所启发的学者而言,仍然是个很大的盲点。^①

对这些议题,究竟我们的研究与现行的学说有何不同,我们会在以下描画出我们的主张,其后每章再作深入探讨。

强经济需要强国家

我们的关键论点是,经济上更具活力的国家都是强国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1962)对欧洲后工业化的主要研究大概已不经意地形成了一个非常不同的观点。格申克龙遗留至现在的是一个几乎无懈可击的概念,即一种中央信息协调机构(a central coordinating intelligence),无论其形式是政治和/或金融机构,对“后”工业化(“late”industrialization)和国家前期发展最为重要。但作为一种后果,对于先发国家(early developers)或当国家已进入了工业化阶段来说,活跃的国家干预就被看得不重要了[弗里德里克(Friedrich)(1885)最早提出了这个观点]。

因此,许多评论者都把经济变革的历史与当代轨迹以“二元性”的观点分开来看。“后工业化国家”也许需要强大的政治机构和领导。但相对于早期的工业化先锋和今日的已发展国家而言,却需要另作别论。当然,这些概念得以确立是因为把变革当做一次性的过程,即使那些肯定国家行动主义(state activism)能令东亚工业成功的人也会很快地认为,后工业化完成后,强大的政府便会终结。(见第6章)

我们的研究讨论上述论点及其所假设的发展二元性。我们的论点是,相对强大的国家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是一个决定该国在国际经济

^① 将“相对”放在“自主性”之前,就如 Poulantzas(1973)和其他新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那样,也无法逃避这个问题。不对资本做同样处理就意味着资本的自主性是绝对的。这点来自研究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论文献中的一些中心论点。典型案例和公平的评论见 Kohli(1986)的研究。